

风物 深度

金马最佳纪录片提名《九枪》：导演专访，台湾施行的是文明面貌的奴隶制

“其实台湾就是比较温和的奴隶制，有文明面貌的奴隶制，外面看来是没有，但里面的心态是奴隶主的心态。”



导演蔡崇隆。摄：陈焯辉/端传媒

特约撰稿人 翁煌德 发自台北 | 2022-11-19

2017年8月31日，一名越南移工在警方追捕过程之中遭到警方连开九枪致死。对于一般台湾人而言，这未必会是一则头条新闻。但对于长期关注移工人权议题的导演蔡崇隆而言，此事却让他得到很多警悟，进而选之作为纪录片拍摄主题。在本届金马奖，蔡崇隆以《九枪》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也是获奖热门之一。

在《九枪》当中，导演以越南移工阮国非遭到九枪杀害的事件为轴，一路扩散出去，回顾了台湾近二十年来的重大移工事件，包括高雄捷运泰劳抗暴事件等。同时也搜集了警察、律师与仲介等人的观点，使观者不仅得以窥见在台移工的恶劣处境，也能理解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

除了上述脉络的梳理，最令观众震撼的无疑是警用密录器画面的完整公开，观众可以看到警员陈崇文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阮国非开枪，可见当下警员在场叫嚣，而已经丧失反抗的能力的阮国非就这样倒卧在地上任由他当作靶子般射击。如此直面暴力的态度，使得本作注定成为近年来最具争议性的台湾纪录片作品。

蔡崇隆不希望观众看完《九枪》之后，只是陷入一个二元对立的迷思。对他而言，这件事情不是挺移工和挺警察的选择题。



真相并非拍摄重点

蔡崇隆回顾自己当时看到新闻之时，正与纪录片导演的妻子阮金红和其他移工伙伴享用晚餐。他形容当下只觉得这是一个“很神秘的意外”，因为就他长期观察移工人权的理解，警察追捕移工往往是一个无害的过程，就是你追我跑，“追不到就算了”。但遭到开枪打死，他形容这简直像是在追杀通缉要犯，也诚如阮爸爸事后所言，拒捕开枪合理，但开到九枪，是任何人都无法想像的局面。他说：“正常来讲，一个警察就算开枪也不会开到这么多枪，因为基本上这样一定会致命，而且果然（阮国非）就死了。”

而且随著对后续细节持续的关注，蔡崇隆发现背后有著许多难以解释的状况，例如没有人知道阮国非当时为何会全身赤裸出现在河边，而且当时还是他的上班时间。最启人疑窦的是，阮国非明显刚吸完毒，但是他平常在工厂其实是一个小工头，工作之一就是负责督促移工不能吸毒，甚至还曾负责将违规的移工送回家乡，是一个相当有责任感的人。蔡崇隆觉得这背后可能有太多阴谋论空间，但随著阮国非的死，真相已经无从解答。

经过一年准备，蔡崇隆在2019年正式开始漫长的制作计划。但对他而言，这部作品与他过去《岛国杀人纪事》三部曲的角度不同，不会将重心摆在案件的真相调查，而是开枪前的社会结构跟开枪后的社会反应。阮国非之死只是单一事件，他更想从中去探讨台湾对待移工的态度。至于之所以使用密录器的影像，蔡崇隆认为这也并未脱离他想要谈论的核心，他认为影片的内容可说是一整个台湾社会的隐喻。

至于之所以使用密录器的影像，蔡崇隆认为这也并未脱离他想要谈论的核心，他认为影片的内容可说是一整个台湾社会的隐喻。

蔡崇隆首先强调这个画面是在法庭公开审理时就曾公开播出的画面，所以并不是一个不能让大家知晓的内容，只是之所以可以取得影片，也是有赖一个不知名的贵人私下提供，对方正好也看过《岛国杀人纪事》，对他有著绝对的信任。对此，我忍不住问起导演，这样贸然使用片段，是不是会担心遭到提告咎责？

早已身经百战的蔡崇隆洒脱地说，照理好像是要跟竹北分局取得授权，但他也知道警方绝不可能授权给他，就算如此，片段还是得用。他坦言自己在拍摄《岛国杀人纪事》系列时，也照样放入了关键录音档与未经允许的偷录画面，但最终亦无一人对他提告。蔡崇隆强调，这是牵涉公共利益的问题，即便被告上法院，他也已经准备好说词，也会坦然面对审判。



纪录片《九枪》。图：金马影展网页

密录器是台湾社会隐喻

平常台湾人对美国黑白种族歧视的议题有所关心，但对国内的移工处境却是一概漠视。蔡崇隆问道“无视和漠视有比歧视好吗？”

唯一让蔡崇隆却步的，反而不是司法问题，而是伦理问题。他知道在纪录片伦理之中有一个重要的要求，那就是不宜以奇观式的态度去展现弱势者的处境，但就这部作品的脉络来看，他又觉得使用有其意义。蔡崇隆指出：“陈崇文等人是第一层，我们是第二层的旁观者，我们是透过纪录片来旁观。如果你认为第一层的人的行为或反应是有问题的，那你第二层的人反应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人家有问题，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对我来说这是个挑战，讲白点我想要挑战观众。如果你觉得人家不应该，那你会比较好吗？”

换言之，导演希望让观众有著身历其境之感，平常台湾人对美国黑白种族歧视的议题有所关心，但对国内

的移工处境却是一概漠视。蔡崇隆问道“无视和漠视有比歧视好吗？”他进一步解释：“那个密录器好像有个象征，或者是一个很直接的一种隐喻、一种台湾社会集体态度的隐喻。我一方面知道会让大家痛苦，但是我一方面要挑战。你觉得别人不应该，那你在这个大社会里面做了什么？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不是沉浸式的感觉的话，这个东西很容易看了就过了。你觉得痛苦没关系，你看了很痛苦，可是那个人根本就是死在这边，你只是痛苦，他可是死了。我们的痛苦能够跟他的痛苦比较吗？”

不过蔡崇隆却也不希望观众看完《九枪》之后，只是陷入一个二元对立的迷思。对他而言，这件事情不是挺移工和挺警察的选择题。透过密录器影像的呈现，我们也可以完全看见陈崇文是明显训练不足的，更可怕的一点或许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开枪不是虚拟的电玩游戏，而是会对人体造成致命的伤害。诚如阮国非的律师刘继蔚在片中所言，陈崇文简直“把他当作丧尸”，而现场其他警察也容许了他的行为。

蔡崇隆提醒观众，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开启密录器的陈崇文，其实也等于是本片的摄影师之一，他显然知道自己呈现出了什么。

如果有观众读到新闻时，会对陈崇文有妖魔化的想像，或许看完纪录片也会改观，他在当下其实明显不知所措。为此蔡崇隆也访问了其它警察的说法，惊讶地得知警察虽然受过用枪训练，却欠缺生命教育的学习，等于把人当靶子。而且每次高层都下令“大胆用枪”，但出了事却也是警员本人要自己承担法律刑责和社会谴责。

蔡崇隆说自己原本打算也能问到陈崇文本人的说法，但其实仔细想想，似乎也已经能够料想他能给出的答复，除非想要创造的是麦可·摩尔（Michael Moore）纪录片般的那种英雄感，否则蔡崇隆认为这样拿著摄影机去对付小警员其实大可不必。然而在一次访问律师邱显智律师时，遭到陈崇文姑姑强行打断，他发现机不可失，追上去与她留下了资料，等于又一次机缘，让作品得以获得更完整的观点呈现。

也许对于较同情阮国非的观众而言，对陈崇文姑姑的论点显然不会同意，但蔡崇隆认为她至少提出了她的立场的观察，大概就是近似菲律宾人民看待毒品问题的角度，也说出了渺小警员的心声。不过要是说片中没有陈崇文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蔡崇隆提醒观众，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开启密录器的他，其实也等于是本片的摄影师之一，陈崇文显然知道自己呈现出了什么。





导演蔡崇隆。 摄：陈焯 /端传媒

台湾就是移工之岛

台湾其实本质上就是一座移民工之岛，除了早期的原住民之外，所谓的唐山过台湾，来台湾的汉人移民都是移工，也就是一种经济移民。

《九枪》在金马影展首映后，有观众表达了心声，认为自己甚至更同情警察的处境。蔡崇隆闻之没有不以为然，但他也说道：“陈崇文遭受到的这一切，道德和法律的代价，能够比得上阮国非吗？你觉得陈崇文很可怜，阮国非却是死在那边，陈崇文只是调去内勤或变成行政；你说陈崇文很可怜，但是阮国非27岁就死了，你怎么能去比？我只能说我可以理解陈崇文还有背后体系的关系，我的理解就到这里而已，但是我不去过度同情地说‘你也很可怜、也是很紧张’。那是你的事啊，你个人不能被苛责，但至少要去想我们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警察体系？”

“不能一直去想小警察个人很可怜，因为这样还是失焦。不要弄成是非题，变成二选一的选择题，这个事情不是这样想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申论题和问答题。”

从阮国非事件之后向外扩散，纪录片也开始谈到了台湾多项公共建设如高铁、北二高等重大建设其实也都是由东南亚移工贡献劳力才得以完成，但在这些光鲜亮丽的后面，其实也造成了相当严重的伤亡。蔡崇隆指出由于实在有太多非法移工参与其中，数据亦不透明，至今仍不知有多少移工死于建设过程。他说道：“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无论合法、非法都应该要有一个死亡的数据，如果连这个数据都没有，就真的只是把

别人当工具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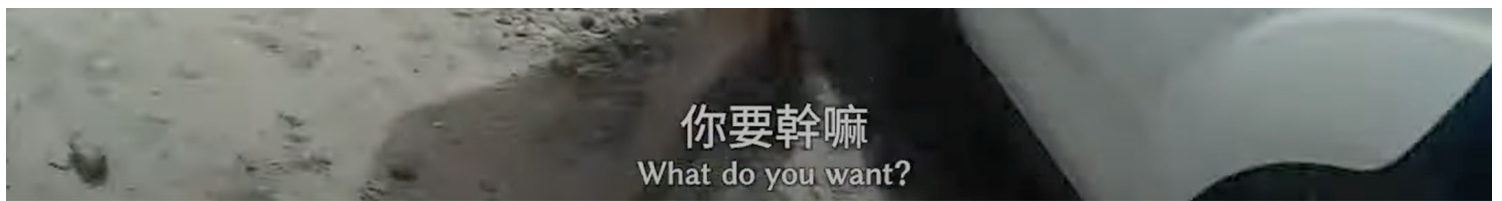
对比卡达为了世界杯足球赛场馆建设，十年死了6500人的新闻，蔡崇隆说他敢打包票，台湾十年下来死去的移工绝对更多。他说为了这部纪录片，他原有计划访问国家人权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陈菊，结果整整约了一个月，对方起先答应，后来又莫名回绝，这让他不免感到纳闷。目前《九枪》也要进行几场放映，他原本想要提出邀请，但又忍不住想说：“如果真的关心就要自己来看，还要我去邀请吗？”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无论合法、非法都应该要有一个死亡的数据，如果连这个数据都没有，就真的只是把别人当工具而已。”

许多台湾人谈到移工人权议题，会觉得与自己太过于遥远，但蔡崇隆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台湾其实本质上就是一座移民工之岛，除了早期的原住民之外，所谓的唐山过台湾，来台湾的汉人移民都是移工，也就是一种经济移民。一直到战后来到了数百万外省人，其实就是所谓的战争难民，外省老兵也是所谓的军人身分转移工，有些也是婚姻移民。不过1990年代后东南亚移工进来台湾却无法轻易移民，到了一定年限就要被迫返国，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台湾社会对东南亚移工的普遍轻视。

“一批批人进来，但是我们前面的人在排斥后面来的人。但是我们本质是一样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啊，如果本质是一样的，我们就是一个移民工的后裔的话，而他们也是人，那我们今天对台湾人怎么样，就应该对他们怎么样啊！”蔡崇隆感叹。





纪录片《九枪》。图：影片截图

其实是比较温和的奴隶制

“我们台湾人之间这样对待彼此不正常，可是为什么在产业或家庭里面的移工劳雇关系，我们就可以允许雇主去控制人家？称之为‘学坏’？”

但现实生活却不是如此，诚如《九枪》当中一名受访移工控诉台湾仍有奴隶制。蔡崇隆也希望透过这部作品的呈现看到台湾人不愿面对的真相，他说自己曾遇到雇主不愿放自己家的外籍看护与外界接触，理由是担心他们会“学坏”，言下之意就是怕他们因为接触了外界之后有了比较心态，最后导致雇主难以掌控。但蔡崇隆说，这些看护又不是未成年人，这样的字眼背后传递的讯息其实不言而喻。

“我们台湾人之间这样对待彼此不正常，可是为什么在产业或家庭里面的移工劳雇关系，我们就可以允许雇主去控制人家？称之为‘学坏’？其实我们就是比较温和的奴隶制，有文明面貌的奴隶制，外面看起来是没有，但是里面的心态是奴隶主的心态。”蔡崇隆叹道。

谈到未来放映活动的规划，一样是老生常谈，目前台湾纪录片能够露出的管道不如剧情片丰富，除非是特定题材，否则这类社会人权关注的纪录片几乎难以在戏院获得成绩，所以他目前已经与团队著手规划，采取有别于商业发行的定点放映，希望能让作品细水长流。于此，我还是问起了导演一个经典问题：纪录片真的能够改变社会吗？

“我觉得关于纪录片介入社会很好，但是不要太目的取向，也不是所有纪录片都要改变社会，现在很多作品跟改革社会没有关系，所以那个是有点把纪录片窄化了。”蔡崇隆指出：“纪录片是观念传播，本来就不能要求有立即而明显的改变才叫成功，然后很多片子发挥的是长久的影响，这个很不容易量化。我的《岛国杀人事件》可能二十年后还在播，可能还是有人在看，像我现在知道一些比较年轻的法官、律师，甚至片子我里面访问的警察，他们都看过我的片子。那你说这个不算影响吗？这个影响可以量化吗？没有办法吧！”

“我觉得关于纪录片介入社会很好，但是不要太目的取向，也不是所有纪录

片都要改变社会，现在很多作品跟改革社会没有关系，所以那个是有点把纪录片窄化了。”

“观点的深度，论述策略也会影响片子的生命力。你不能太说教，你不能去教训观众，甚至你连教育的观念都不要有。现在的观众没有这么笨，他看了有感觉就有感觉，他会想到什么就让他自己想。如果我们相信观众的能力的话，那你要给他一个思辨空间，而不是直接跟他直接讲答案，让他自己思考到底能不能改变社会。”蔡崇隆语重心长说。

“看纪录片时，你也不只是一个消费者，因为你看的是真的东西，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真的，但是里面有真实的素材在里面。所以对于真的在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你觉得不好，那要不要改变？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有自己要做的事，可不要都赖在纪录片导演身上。”



导演蔡崇隆。摄：陈焯 /端传媒